

美国科幻文学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建构模式研究

On the Construction Modes of the Utopia and Dystopia of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叶 冬 (Ye Dong)

内容摘要: 科幻文学的基本特征在于建构超越社会现实的理想社会, 展现人类发展的未来图景, 或再造人类既往的历史。因此, 科幻文学本质上就是一种乌托邦式书写。20世纪美国科幻文学推动着世界科幻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并呈现出了“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建构模式。前者表现出了“技术-社会图景”与“社会-技术图景”两种建构模式; 而后者则呈现出了“科技与文化”以及“政治与伦理”两种批判意识。在网络与数字化背景下, 科幻文学的创作也将开启“数字乌托邦”与“数字反乌托邦”的新时代。

关键词: 美国科幻文学; 乌托邦; 反乌托邦

作者简介: 叶冬,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科幻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

Title: On the Construction Modes of the Utopia and Dystopia of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Abstract: Science fiction is essentiall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deal society that transcends the status quo, either to demonstrate the prospect of human development, or to rewrite history. Therefore, science fiction is basically a kind of utopian writing. In the 20th century, as a driving force of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fiction worldwide,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displayed two contrasting trends: the utopian thought and the dystopian. The utopian thought has two constructing modes as “technology-society view” and “society-technology view”; while the dystopian presents two critical consciousness a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s “politics and ethic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network and digitization, science fiction has entered the epoch of “digital utopia” and “digital dystopia”.

Keywords: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Utopia; Dystopia

Author: Ye Do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yedong@hunnu.edu.cn).

20世纪以来,美国科幻文学与乌托邦文学在观念上存在着一种“爱恨交织”的亲疏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美国国内或国际政治、科技、经济、文化等方面极速变化对作家以及社会大众的心理所造成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所致;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发展科学与伦理、技术与艺术、世俗与宗教、整一与多元、专制与法制、自由与公平、对抗与融合等各个领域与各个层面的冲突,在不断地解构和重塑着美国科幻作家对于未来乌托邦愿景的设计理念。正如美国思想家乔·奥·赫茨勒(J. O. Hertzler)所言:“乌托邦思想家既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又是超越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既是人类中罕见的一种人,又是起到特殊作用而有别于他人的人;既是进行的产物,又是进化的原动力;既是置身于社会之中又是在社会之外的人;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潮流,又受到世俗苦痛的支配。他们是人们所期望的人,又是独特的人”(252)。

科幻文学中的“乌托邦”建构与纯粹的乌托邦文学相比,有着一定的差异。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科幻文学中的“乌托邦”必须建立在超越现实的技术装备与极赋想象力的时空之上。因此,科幻文学的“乌托邦”,既是道德上的乐土福地、历史上的乌有之乡,也是科技上的宇宙之梦和太空歌剧。它是科技推动下不断延展的、史诗般的宏大图景,也是人类超越现实、追求人性完美的理想图示。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阐述历史与乌托邦思想时说:“当历史不再是盲目的命运,而越来越成为人本身的创造,同时乌托邦已被摒弃时,人便可能丧失其塑造历史的意志,从而丧失其理解历史的能力”(268)。而倘若乌托邦实现了,那么它也就失去了历史的意义,因为历史表明人类永远也不可能达到那样一种完美的状态。这也是科幻小说中乌托邦思想生发的原力与拓力。

一、美国科幻文学的“乌托邦”建构

与乌托邦的“乌有之乡”不同是,从19世纪开始,美国就被人们称作是“希望之乡”(Hopeland)。一代又一代的移民在这片广袤的北美新大陆上踏着先辈的足迹,追寻着自己的“美国梦”。显然,美国移民中清教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主流思想大大减轻了美国文学(包括科幻文学)中关于乌托邦的政治设计、制度构建、道德规范的沉重感,人们按照共同的社会契约和新教的理想来设计一个全新的社会,这与背负沉重历史负担和批判精神的欧洲大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美国科幻文学中的乌托邦主题也就呈现出了别样的魅力。综合来看,在20世纪现当代美国科幻文学中,“乌托邦”的建构包括了以下两种颇具代表性的建构类型,并呈现出对接与融合的趋势。

(一)“技术—社会图景”的乌托邦建构

现当代美国科幻文学的兴盛,与20世纪以来美国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之

间有着密切的关系。19世纪末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科技的畸形发展，引发了人们对技术的无限遐想，也导致了美国科幻文学在“流行杂志”时代影响力的扩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在“黄金三十年”期间，美国在科技与经济实力上傲视全球，并最终赢得了冷战胜利。这一时期美国科幻小说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展示了在史诗般背景下，技术带给人们的无穷想象力。20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美国政府主导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的实施，美国率先进入网络与数字时代并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引领者，科幻文学中赛博朋克风格也随之兴盛。可见，现当代美国科幻小说的发展，离不开一个重要的驱动力，这就是科技发展所引发的人类对未来的想象与预设。当然，这种预设与想象包括了乐观与悲观两种价值取向。但在20世纪，相比于审慎、理性和保守的欧陆学者而言，开放、自信和极具幽默感的美国人有理由对未来持乐观的态度。

由于存在自身的生理极限，人类发明了种种技术以及装置或装备，从而使人的生理极限被打破，并使人的力量趋于无敌与无限。“现代人和古代人看待周边世界的态度，其根本区别在于：对于深受科技浸淫的现代人而言，现象世界本质上是‘它’；而对于古代人（也包括原始人），世界是‘你’”（Frankfort 4）¹。科技在改变自然的同时，也改变了人本身。那个关于人类的古老命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往何处去——依然在拷问着人们，只不过是置于现代科技的场景之中。因此，20世纪科幻小说中关于“乌托邦”的美国式建构，大多遵循的是从梦幻般的未来性科技图景入手，进而触及到持有这种科技的人的内心世界和价值观念，并最终对这个“未来社会”既往的历史、现实秩序和法则、发展和延续的理念进行叙述、说明与描绘。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将这种模式称为“技术—社会”的乌托邦建构模式。

众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美国科幻小说都属于这一模式。其中最富盛名的作品如：爱德华·艾默·史密斯（Edward Elmer Smith）的“宇宙云雀”系列、杰克·威廉森（Jack Williamson）“太空歌剧”系列作品《时间军团》（*The Legion of Time*, 1938）与《月亮孩子》（*The Moon Children*, 1972）、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基地三部曲”、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Anson Heinlein）的《星船伞兵》（*Starship Troopers*, 1959）和《严厉的月亮》（*The Moon Is a Harsh Mistress*, 1966）、雷·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的《火星编年史》（*The Martian Chronicles*, 1950）以及克里福德·D·西马克（Clifford Donald Simak）的《星际驿站》（*Way Station*, 1963）等。艾萨克·阿西莫夫的作品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仅从技术造物的层面描绘了机器人的功能与技术形态，并且还从中衍生出了机器人的

1 本文外文引文出自笔者译。

技术伦理,即“机器人三定律”。他在“基地系列”中关于银河帝国命运的思考,并没有将帝国命运单纯地置于技术与物质层面进行考量,而是以人类历史上强盛一时的罗马帝国的兴衰为史鉴,以盛极而衰的历史辩证法为依据,为帝国设置了一个由衰亡至复兴的史诗般的历史画卷。正如阿西莫夫所说:“科幻小说中的超现实故事背景,能够令人信服地由我们自己从现有科技阶段发生的适当变化中推演出来(……)通过对我们所能取得的科学进步作出宽泛的解释,我们也可以把不太可能实现的东西囊括进去”(4)。可以说阿西莫夫的作品是这一乌托邦建构模式的范本和标准。

(二)“社会—技术图景”的乌托邦建构

在现当代美国科幻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物质与精神、科学与人文、技术与艺术之间的矛盾冲突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议题。对此,人们不断地反思和追问:科技的发展究竟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理想和完美的科技能否修复现行社会的弊端,能否平复全球范围内的矛盾与冲突,能否带来一个趋向完美的世界?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20世纪中期具有危机感的美国社会,尤其是美国知识界所不能回避的历史责任。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科技是工具,其本质目的是服务于人。但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时期,科技的迅猛发展导致冷战日益升级,人类与地球不断地被逼近到毁灭的边缘,这是人们始料未及且深感恐惧的事实。由此,人们开始思考如何用公平、正义以及富有善意的理念和理想主义的价值观念去驾驭失控发展的科技,并重新思考科幻世界中未来“乌托邦”的设计原则。因此,在冷战的阴霾最为浓重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转向——“新浪潮”时期应运而生。

以今天的视角来评价“新浪潮”时期科幻文学的创作,我们可以总结出诸多不同于前代的特征,如冷战压迫下的社会性恐慌、科幻小说家集体的变革意识、对科幻小说文学性价值的追求等,但从科幻文学的“乌托邦”属性这一视角来看,它反映的是科幻文学家们对科技的工具理性的厌倦、对生硬冷漠的技术装置的鄙视、以及对星际探险和星球大战等老套题材的抛弃。科幻文学创作者们开始追求对未来世界中人性的心理学与社会学的描述、与星际宇宙相对立的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究,以及作为人类社会的价值哲学建构等深层次问题的思考。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找到诸多优秀的科幻作品。如罗杰·泽拉兹尼(Roger Zelazny)用华美、瑰丽而充满诗化的语言,以印度教和佛教转世轮回的信仰为基础所建构的充满哲理意味的作品《光明王》(*Lord of Light*, 1967)。而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则在他的“沙丘”系列作品中,遏制住在技术装备和未来科技方面的想象力的冲动,将关注的视角投向了宗教冲突、生态危机、暴力革命、超自然进化等多个未来社会领域,作者的写作涉及到了政治学、宗教学、哲学、伦理学、生态学、法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堪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这些作品在超时空

的、跳跃式的未来社会的建构中，不仅审视了人性与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危机与问题，也给予了读者从历史神话、宗教、哲学等领域进行理性思考进而参与建构的权利。

20世纪60年代后的美国社会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种种社会问题，尤其是美国社会所特有的结构性问题开始显现，与此呼应的是，各种社会思潮也不断涌现和发展，并成为了后现代文化产生的重要标志。在各种社会文化思潮中，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因此，科幻文学的“乌托邦”世界中，众多的女性科幻作家参与建构并呈现出别样的未来图景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女性科幻作家中，厄秀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是一位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人物。她在《黑暗中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 1969）中对无性社会的描绘，被认为是女性主义最危险的寓言，也是对男权社会最骄傲的宣言。就象沃伦·罗切尔（Warren Rochelle）所认为的那样，勒奎恩“提倡一种真正的人类社群。在这一社群中，人类可以过着一种有价值和有尊严的生活”（173）。事实上，正是由于女性科幻小说家的加盟，才使得美国科幻小说中新浪潮运动的声势和影响得以扩大，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一味追求技术的“硬科幻”创作模式和写作方法，使科幻小说有了更为丰富的社会主题和意识，推动着美国科幻小说在文学风格和文学价值两个维度上向着多元方向发展。

二、美国科幻文学的“反乌托邦”书写

如果说“乌托邦”映衬的是人类对未来至真、至美、至善的憧憬和遐想的话，那么“反乌托邦”¹展现的就是在科学技术以及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未来，人类因无法约束科技的失控发展而呈现出的悲剧情景——精神信仰、道德律令、价值观念、社会文明、生态伦理等各方面将面临重大危机和严峻挑战，以及伴随着这些问题的日益恶化所导致的人类社会发展趋于停滞、甚至灭亡的黑暗图景。“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科幻文学的区别在于：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科幻文学中的“乌托邦”式建构持有的是乐观和积极态度。这类作家坚信人的自律性发展可以抵抗人性中的恶，并在向善的自我救赎中实现人类社会日趋美好的发展图景，而科幻文学的目的就是要展示这种图景，并表明其中的差距。“一方面，许多科幻作家把乌托邦小说视为科幻的一部分，自己撰写乌托邦小说。另一方面，随着科幻（作品）越来越关注世界建构的复杂性，在其中科幻作家设计出自洽的或然世界。世界建构已经成为科幻小说所提供给读者的最可称赞之物，而这些建构许多都是源自于乌托邦小说”（罗伯茨 3）。反之，科幻文学中的“反乌托邦”式作品对所谓

1 “反乌托邦”（Dystopia 又作 anti-utopia 或 cacotopia, kakotopia），学界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尚未统一。有些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对于一切乌托邦美好想象的否定和批判；也有些学者将这种反面进行细分化呈现，如“恶托邦”“敌托邦”“废托邦”“坎珂邦”等。

“乌托邦”持有的是消极甚至是悲观的态度。这类作家认为,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结果是信仰的崩塌和价值观的沦丧;是物质主义的泛滥和对财富以及资本的极端追求。除此之外,大工业技术背景下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给予人们的痛苦记忆,更加剧了人们对科技之于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反思以及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走势的焦虑。在此前提下,一批具有历史责任感的科幻文学家们开始自觉抛弃自身的“乌托邦”幻想,并从传统的“乌托邦式”书写中抽身出来,不再沉溺于科学虚构与认知经验(或是虚构新异与经验语境)的替代、跨越与疏离,而是以怀疑和批判的视角去撕裂“乌有之乡”的所谓共有的理想图式,消解传统“乌托邦”思想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历史逻辑性,并将一个与“乌托邦”相悖离的、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令人绝望的未来“恶托邦”呈现在世人面前。

可见,“反乌托邦”文学也可以看作是“乌托邦”文学的一种类型,或是“乌托邦”文学异化的结果。其原因就在于自19世纪“乌托邦”产生之始,它就是一个开放包容、持续建构的思想和文化体系。

乌托邦小说实际上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文化领域。在这个领域,历史仍未消失。乌托邦记录的是我们对未来的种种幻想,但是在一个充斥着压制与反抗的连续性叙事过程中。这些幻想又体现了我们与当下现实的关系。乌托邦式的冲动起因于现实中根本性的缺陷,它解构了我们对于社会必然性的假设,解构的方式是通过引起生活中的现实和隐藏在现实中的潜力两者之间的认知不一致而表现出来的。乌托邦促使我们唤起了政治欲望。(Pfaelzer 198-199)

在现当代美国科幻文学史上,受欧陆“反乌托邦”文学及美国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也产生了诸多“反乌托邦”科幻作品。这些作品与美国社会现实有着紧密的关系,并以一种反讽的风格体现出了美国式的“反乌托邦”文学特征。

(一) “科技与文化”的反思和批判

美国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在《基地》(*Foundation*, 1951)中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在银河帝国首都川陀星上,人口密集,工业发达。小说中的心理学家哈里·赛尔登通过心理史学预测了500年后末日的到来。对此,赛尔登向统治者提出了拯救帝国的“赛尔登计划”——招募众多学者到银河系两个偏远的星球基地从事《银河百科全书》的撰写,目的在于保存人类的全部知识,避免帝国毁灭时历史和知识的失落。就小说的内容而言,它流露出人类对未来命运的忧虑以及自我拯救的强烈欲望。而在人类现实世界和真实历史中,这种类似情形也曾上演过。1968年4月,在意大利首都罗马近郊的山猫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一批科学家、社会学家和商界领袖会集在一起

探讨如何面对人类和地球所面临的多重危机。会后组建的“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了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印刷了3000万册，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报告预言了人口、资源、经济等增长的极限性，并对未来世界可能面临的全球性灾难进行了预测。第二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西方社会“黄金三十年”的发展戛然而止。由此，“可持续性发展”成为了人们超越集团利益以及意识形态冲突而共同关注的主题。

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引领着全球的科技走向。对于超越现实人类认知经验的科幻文学而言，关于未来“乌托邦”的技术想象和技术建构，美国科幻作家无疑有着更多感知能力和想象空间。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却是：“乌托邦”毕竟不是纯粹的“科技乌托邦”；技术也不是纯粹的造物活动——其目的是服务于人，并为人类的持续发展提供长期福利和美好希望，而不是将科技凌驾于人之上，使人异化为科技和机器的奴隶。人在获得人的形式之后，同其他动物的不同就在于能够通过教诲进行正确的伦理选择，从主体上把自己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¹在美国科幻文学关于科技的伦理思考中，科技使用的动机与目的之善恶选择，也成为了科幻作品热衷的主题。人类对科技的激情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危机是同步的，这一点对于身处冷战时期核战争边缘的美国科幻作家而言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因此，部分美国科幻作家对科技的未来发展及其给人类所带来的前景持焦虑、忧患以及悲剧式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恰恰在冷战进入白热化的时期，美国科幻作家对所谓科技至上的“乌托邦”式图景普遍持“反乌托邦”的态度。其作品主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技沦为“恶”的帮凶而导致人性的消亡与人类的毁灭。如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的小说《路》（*The Road*, 2006）向人们揭示的是未来核战争爆发之后，处于核废墟的世界里人类生存的恐怖景象——由于物资资源的匮乏，人们为了生存而绝望地相互残杀或自杀。该作品以残酷诗学的语汇呈现了人类的末日景观。二是对科技导致人异化的反思与批判。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 1984）向我们呈现了在网络与数字技术背景下，高科技信息技术与垄断资本、政治权力以及跨国集团相互勾结，利用电脑与互联网，以违背道德伦理和商业伦理的手段，使用网络技术在赛博空间内所进行的商业犯罪的故事。该小说在叙事上，一方面向读者描绘了网络世界中神奇的数字空间，以及主人公的意识脱离肉体切入交感幻觉世界（矩阵）的绝妙体验；另一方面，作者又向人们展现在网络与信息时代，作为数字化生存的个体和组织只不过是打上数据化的标签与符号的“物”而已。在网络这个无规则的西部疆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4.

域，拥有高技术手段的组织和个人完全可以漠视文化与价值观上的道德律令，雇佣网络牛仔（黑客）自由而随意地打开、复制、下载、删除对自身或他人有价值的信息，从而为个人、组织或集团牟取最大的利益。威廉·吉布森的这一作品撕裂了人们对于网络与信息时代的美好想象，并把一个令人震惊的“科技恶托邦”呈现在读者面前。

（二）“政治与伦理”的反思和批判

“科幻小说在20世纪乌托邦小说里占据特许地位的原因，在于它明白生活如果没有其他变化，社会政治也是不可能发生变化的”（苏恩文 565）。美国现当代科幻文学中“乌托邦”另类建构的逻辑是：在物质、技术、生态和社会环境发生本质性变化的前提下，着力于未来时空场域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价值信仰以及伦理道德的再造。但有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是，这一再造的原则是与当下社会现实相关联的，它表现为以一种更好或更坏的图式揭示当下社会发展的可能趋向。正如阿西莫夫所说：

如果你想建立一种新型社会，并对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们行为进行研究，那么你将如何着手？

照我看来，你会从下面三种开场白中的某一个着手。

如果……怎么样（提出建议）

如果……该多好（乌托邦）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反乌托邦）

第一个主题可以称为第三时期的A阶段，它产生出无须适应当今时代的问题小说。（169）

19世纪以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使整个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导致了各种政治哲学的粉墨登场——世界成为了一个政治哲学的“实验室”。进入20世纪以后，阶级冲突、价值冲突、文化冲突、宗教冲突、民主自由与专制集权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形成了世界性的、两级化的意识形态对抗。对于欧美的知识阶层而言，对现实的焦虑最终转化为了观念层面上的困惑和失望。“事实上，当我们到达晚期或后现代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金融资本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乌托邦冲动和选择已经被尽可能地窒息和压抑了”（詹姆逊 217-218）。无法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以及无法超越的现实冲突，逐渐消解了科幻文学家建构未来“乌托邦”的兴趣，转而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社会底层孤独无助的个体，并对他们未来在专制极权以及阶级压迫下的命运做出悲剧性的展映和彩排。

被誉为“另类的反乌托邦书写”（刘晓华 117）的科幻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1968），则描绘了一个末世大战后的地球。在政府殖民计划下，人类的未来要么移民至外星

球，要么因受地球上核辐射的危害而逐渐退化直至消亡。除了通过电视媒介宣传在火星上可完全复制美国内战前南方各州的安逸日子外，小说并未将笔触落在对未来新世界的乌托邦的幻想里，而是聚焦于被放射性尘埃逐渐基皮化的地球。面对从外星球逃回地球的人形机器——“仿生人”，作者菲利普·迪克（Philip Dick）通过主人公“赏金猎人”里克提出了对“何以为人”的伦理标准的反思与追问。

主人公里克一直饲养着一头电子羊，但他从未考虑过电子动物与仿生人之间的相似性。从某种角度看，同样都是机器，电子动物“可以看成是仿生人的低端型号，是低劣很多的仿生人”，而“仿生人可以看成是高度发达进化的假动物”（迪克 42）。仿生人与人类相比，在外形上毫无差别，在智力体力上则更胜于人类。作为精心设计的高科技产物的仿生人一直在试图摆脱机器或者动物属性，通过模仿和学习人类的思想、行为，甚至艺术鉴赏、情感冲动等而努力达到一种“更高级的生命形式”（迪克 142），以期更接近人类。仿生人的本质是电子产品，但具备高级智慧能力的他们似乎更想脱离电子动物的身份，更想成为真正的“人”。人们只能通过不断升级的移情测试甚至是骨髓分析等来鉴别仿生人。移情测试是通过测量脸部毛细血管扩张——“人类最原始的自动反应之一，就是对道德震撼的刺激产生的生理反应”（迪克 46），而“产生移情的一个先决条件是群体本能”（迪克 29），道德震撼产生群体本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指人类的伦理判断。伦理判断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伦理选择是人在获得人的形式后经历的获得人的本质的过程。仿生人无论是在生物学意义上还是在文学伦理学意义上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

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文明三阶段论”的观点，人类社会在经历了自然选择、伦理选择阶段后，最终将步入科学选择。¹在科学选择阶段到来之前，或者说在从伦理选择阶段到科学选择阶段的进阶中，高度发达的未来科技将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变化？人们将如何面对科学选择对伦理选择主体的存在、本质、价值和尊严等产生的挑战——这也正是作为现实可能性和客观可能性的科幻乌托邦书写的反思或意义所在。伽达默尔曾指出：“人类的未来要求我们不只是去做我们能做的一切事情，而且要求我们对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做出理性的判断”（388）。高度类人化的“仿生人”虽然具有人的形式，但只有具有人的形式而且也具有人的属性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人的形式是人的外部特征，是人存在的前提条件，人的属性即人性是人的内部特征，是决定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菲利普·迪克不仅细腻地描述了人与“仿生人”之间的伦理属性、差异冲突以及共情过程，更展现了人类在一个绝望、封闭及冷漠的世界里如何反思人性、恢复善意、重拾希望的自我救赎的过程。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4.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人类的乌托邦冲动根植于精神世界对未来的希望，科幻文学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建构则交织在可能性与批判性的探索当中。科幻文学从产生之初开始，就带有理想化的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的建构意识，这是它与生俱来的气质和烙印。从科幻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既承袭了古代西方幻想文学的渊源，又依托了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内涵，从而共同构筑出了这一独特的文类。罗伯茨认为：“世界建构已经成为科幻小说所提供给读者的最可称赞之物，而这些建构许多都是最初来自于乌托邦小说”（3）。将乌托邦置于科幻文学之中，目的并不在于简单地指出科幻文学中存在着这一类型，而在于说明科幻文学拥有的一种本质属性——弥散于科幻文学作品中的、或明或暗的现实修订与伦理选择的主观倾向——建构超越社会现实的理想社会，或再造人类既往历史。因此，科幻文学的创作，本质上就是一种“乌托邦式书写”。20世纪以来，科幻文学的乌托邦建构一方面伴随着科技跃升而不断产生着主题嬗变和风格更迭，另一方面又通过这种思想实验来不断进行反思、剖析和批判，加深人们对世界矛盾的本质认识。当下，人类进入了网络与数字时代，科幻文学也被置于了“数字乌托邦”和“数字反乌托邦”的伦理选择之中——开放或封闭；个性解放或精神依赖；数字受控与失控；信息共享或压迫；人工智能与伦理危机；身体解放与心灵流浪——在虚实混沌的世界里，科幻作家们又将给未来的“数字人类”建构一个怎样的“乌托邦”，我们将拭目以待。

Works Cited

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涂明求、胡俊、姜男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

[Asimov, Issac. *Asimov On Science Fiction*, translated by Tu Mingqiu, Hu Jun and Jiang Nan. Hefei: Anhu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1.]

菲利普·迪克：《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许东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

[Dick, Philip. *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translated by Xu Donghua. Nanjing: Yilin Press, 2017.]

Frankfort, H. and H.A. et al. *The Intellectual Adventure of Ancient Man: An Essay on Speculative Thought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Chicago: The U of Chicago P, 1977.

伽达默尔：“生活世界的科学”，黄应全译。《伽达默尔集》，严平编选，邓安庆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376-388页。

[Gadamer, Hans-Georg. “The Science of the Life-World.” Translated by Huang Yingquan. *Selected Works of Gadamer*, edited by Yan Ping, translated by Deng Anqing,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Far East, 1997. 376-388.]

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张兆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Hertzler, J.O. *The History of Utopian Thought*, translated by Zhang Zhaolin et al.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9.]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吴静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

[Jameson, Fredric.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 translated by Wu Ji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14.]

刘晓华：“技术控制论的梦魇——解读科幻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国外文学》3（2015）：117-122。

[Liu Xiaohua. “The Nightmare of Technophobia: On the Science Novel *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Foreign Literatures* 3 (2015): 117-122.]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Mannheim, Karl. *Ideologie and Utopie*, translated by Li Ming and Li Shucho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0.]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Pfaelzer, Jean. *The Utopia Novel in America, 1886-1896: The Politics of Form*. Pittsburg: U of Pittsburg P, 1985.

亚当·罗伯茨：《科幻小说史》，马小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Roberts, Adam.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translated by Ma Xiaowu. Beijing: Beijing UP, 2010.]

Rochelle, Warren G. *Communities of the Heart: the Rhetoric of Myth in the Fiction of Ursula Le Guin*. Liverpool: Liverpool UP, 2001.

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郝林、李庆涛、程佳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

[Suvin, Darko. *Positions and Presuppositions in Science Fiction*, translated by Hao Lin, Li Qingtao and Cheng Jia. Hefei: Anhu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1.]